

早期中国

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
考古学研究中心 编

第2辑



文物出版社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的 (JHHT20140507)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2&ZD151)

早期中国研究

STUDIES OF EARLY CHINA

第2辑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 编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早期中国研究. 第2辑 /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010 - 4644 - 7

I. ①早… II. ①北… III. ①考古学 - 中国 - 文集
IV. ①K870. 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3262 号

早期中国研究 (第2辑)

编 者: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杨新改

责任印制: 张 丽

封面设计: 周小玮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0 - 4644 - 7

定 价: 90.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早期中国研究》

编辑委员会

顾 问：严文明

主 任：韩建业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小波 李若水 宋 蓉 陈悦新 张 经

张宝秀 张俊娜 武家璧 林怡娴 周 华

顾 军 黄可佳 韩建业

本辑主编：张 经

编者语

我们这里所谓“早期中国”，实即“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简称，是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也可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

早期中国以中原为核心，并且至少自五帝以来就基本前后相承、连续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认识。但自晚清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中国弱势地位的显现，疑古思潮在国内外渐成风气，这一认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在顾颉刚等主编的《古史辨》中有集中体现。当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王国维、徐旭生等对古史的研究整理，以及20世纪20年代以来殷墟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极端的疑古思潮已经淡出史学领域，商代晚期以来的中国史基本为信史、中华文明的起源在商代晚期以前等观点已成学术界共识，但商代晚期以前是否存在文化意义上连续发展的早期中国，或者这个早期中国有着怎样的文化格局、特质和发展过程，都还没有定论或者不很清楚。即便是商代晚期和周代，其作为“早期中国”的范围和格局也都还歧义纷呈。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中，主要由中国学者进行的绝大部分研究都直接论述中国古代文明或国家起源的时间、标志、过程等，到处冠以“中国”而恰恰对“中国”概念不加深究，对“中国”的范围不加界定，由此自然会引来一些敏感的西方同行的非议。只有少数学者注意到早期或古代的“中国”这个概念本身需要加以研究。这当中，严文明认为中国史前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并且存在“重瓣花朵式的格局”；张光直提出在公元前4000年前已经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

中国文明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特征等，可以说已经初步搭建了早期中国文化格局的基本框架。但这些认识还远未能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还需要深入地广泛地讨论。

围绕着早期中国，值得探索的重大问题还有很多：早期中国形成和发展的环境背景是什么，机制动因是什么？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对此后文化上中国的连续发展有何影响，又是从何种意义上影响到政治上中国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影响到世界文明体系中“中国模式”的形成？认识清楚文化上早期中国数千年的连续发展经验，对于看清中国未来发展方向，选择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于全球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启示作用？

解决这些问题自然当以考古学为基础，同时也需要多学科协作。正如严文明在《古代文明》（第1卷）的“发刊辞”中所说：“我们不但希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力合作，还希望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生物学、地质学和其他有关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学者积极参与。”这也同样是我们编辑《早期中国研究》的宗旨。希望这个辑刊能得到学界的支持和爱护，在早期中国研究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目 录

编者语	(i)
异域秩序：西周晚期和东周早期的礼俗	杰西卡·罗森 (1)
中国早期冶金术：当前研究面临的挑战	梅建军 (74)
公元前 3 至前 1 千纪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尖顶冠形符号	韩建业 (93)
新疆古代青铜器及铜矿资源的分布	李 刚 (101)
吐鲁番地区早期铁器时代考古	张良仁 吕恩国 张 勇 (116)
乌兹别克斯坦发现的铜镞	郭 物 (156)
中国古代方斜率的来源与中西比较	武家璧 (174)
4 ~ 5 世纪洛阳与罗马的陷落	熊存瑞 (186)
后 记	202

异域秩序：西周晚期和东周早期的礼俗*

杰西卡·罗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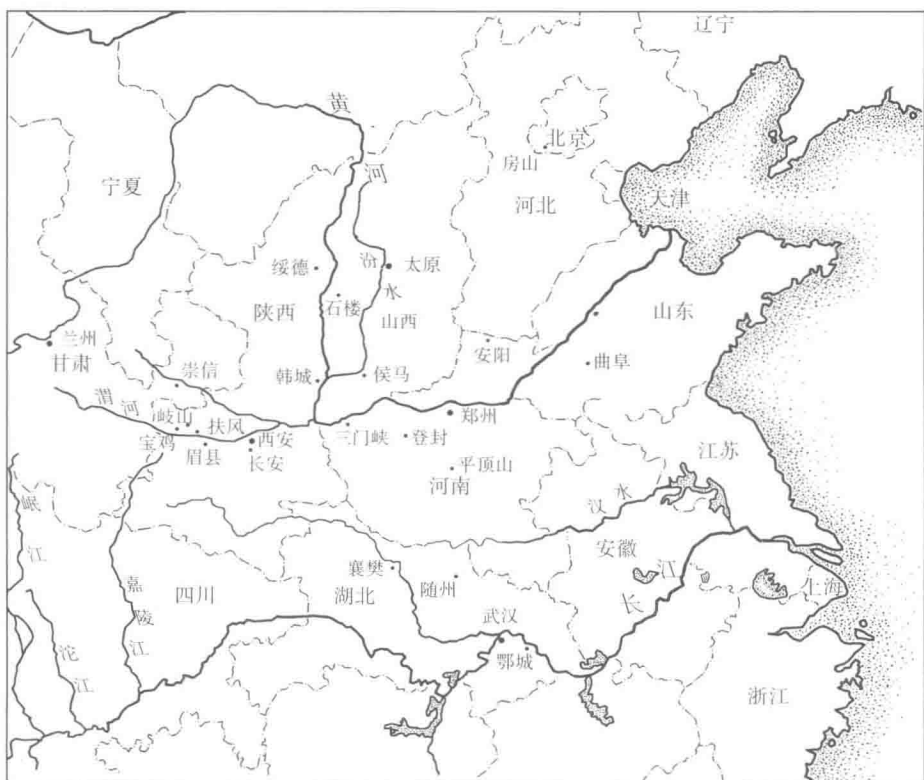
（牛津大学）

陕西省韩城附近梁带村最新的考古发掘透露出^[1]（图一），周人在仪礼展示中对黄金、红玛瑙、铁等异域材料的应用，以及按照北方习惯把特殊青铜器置于更精美的传统礼器中的喜好^[2]。本文将论证，在公元前9世纪的政治危机中，这些取自政治核心区以外的材料为周人带来了新秩序。而这种对于秩序和标准化的尝试，以往总被解释为对社会等级的强化。

公元前8世纪，小国芮的统治者把墓地建在了梁带村（图二，1、2），他们被埋葬在棺室中，棺上装饰着精美的帷幔，帷幔由一条条青铜小鱼、铜铃、贝或石仿贝，以及大量的红玛瑙珠、费昂斯珠或是陶珠串在一起构成（图三）。最奢华的是出土有黄金的M27芮伯墓，M26和M19墓主是他的两个配偶，都佩戴有红玛瑙、费昂斯珠与玉组合的复杂串饰。

公元前9世纪，随着周王室式微，面对内部的挑战，以及与北方、南方敌人的冲突，周疆域内祭祀祖先的礼仪发生了重要变化^[3]。这一变化，也可称为礼制革命或改革，包括一些前所未见的、具有标准形制的成套青铜礼器的制造，以及鱼、铃、贝和珠作为棺饰的广泛流行。这一时期，梁带村的墓主人以类似的材料作为装饰，似乎这种习俗也从渭河流域和今天的

* 本文由张经译，刘艳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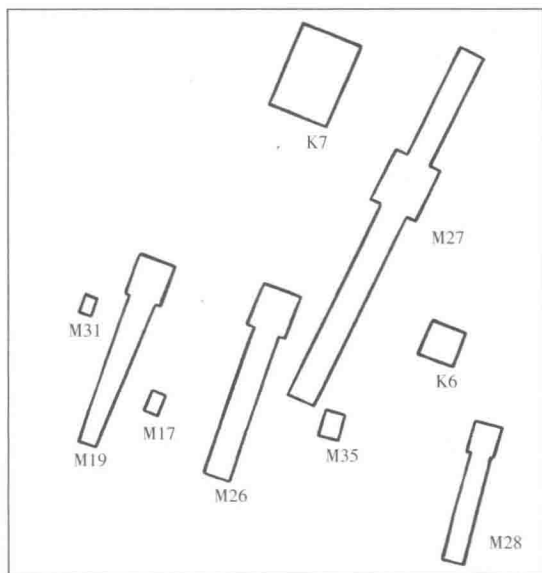
图一 中原及北方周遗址分布图

山西向东扩展。因此，这一时期，周人从邻近地区纳入诸多材料和人工制品，祭祀祖先和丧葬仪式等重要礼仪也已经形成^[4]。

控制着黄河盆地中部的周人，总是通过结合各种仪式，尤其是把宗教与政治活动相结合做法来获得发展，并伴随着革新将其散布到各地，而这种革新通常兴起于与边地部族的交往中^[5]。从商代开始，周人采用汉语作为通用语言，确立了使用范铸工艺铸造的、献祭祖先的成套礼器器形，以及共同的丧葬体系。同时，从统治之初，周人就给中原带来一种新的以“天”为最高权能神的宗教体系^[6]。除了使用商人所用的两匹马驾的车，周人还引入了四匹马驾的驷车，并增加了銮铃作为装饰。驷车的马具、驾驭方式和銮铃是从大草原的邻居那里学来的^[7]。这些马车立即受到中原化的周人的青睐，并有了常规的部件和装饰。马车成为周王最爱赏赐贵族的物品之一，因此，马车变得标准化，并且作为宗庙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开始流布^[8]。为了驾驭马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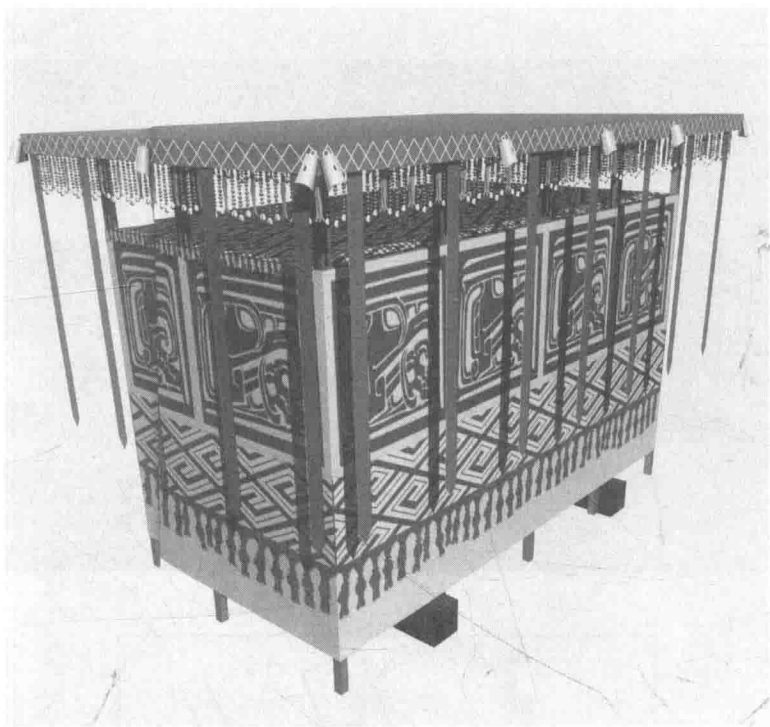
1



2

图二 梁带村墓葬

1. M27 (选自《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第4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以下简称《金玉华年》) 2. 南部平面图(选自《梁带村芮国墓地——2007年度发掘报告》第6页,图四,文物出版社,2010年)



图三 上海梁带村展览复原的棺饰
(选自《金玉华年》第272~273页)

周人还必须通过征服和交换不断从边地部族那里获取马匹。

在这一问题上，占据边地与黄河盆地中部这两个广泛区域的部族对立着，他们的物质文化差异显著。“边地”通常被定义为半月形带，西起四川，经过青海、甘肃的河西走廊，穿过陕西、山西、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东到河北北部、内蒙古赤峰。这一广阔区域内生活着不同部族，使这里成为周贵族眼中的外部，通常充当中原与更西部地区交往的媒介。本文在提到这一地区时，经常使用“西北”一词，更多时是特指河西走廊。

笔者认为芮国是很好的例证，其丧葬体系既受到周边部族的影响，也是周人中原化的结果。墓葬资料显示芮国与黄河盆地的其他同期政权一样，继续使用共同的汉字、墓葬结构和礼器组合。前述礼器组合和棺饰，时代属于公元前8世纪，因而已是礼制改革之后。芮国贵族吸收的一些材料和器物类型，表明其与周边部族存在交往。本文将特别关注与贝及黄金、青铜

和铁制的工具、人工制品一起使用的红玛瑙和费昂斯珠子。此外，下文所讨论的芮、晋、虢国贵族夫人墓中随葬的青铜器，包括微型器，都表现出对北方器形的有意模仿（见图一四）。事实上，对边地材料的享有和使用如此盛行，这一定是有意选择的结果，用以彰显贵族及其配偶的身份和地位。

奢华的视觉展示在任何社会中都代表着身份、地位和社会联系。玛丽·赫尔姆斯（Mary Helms）指出，精美的工艺品——尤其是那些攫取自远方的物品，其重要性在于赋予所有者身份和权力的象征^[9]。对上述材料的讨论，本文将采用赫尔姆斯聚焦外来材料的研究方法^[10]。芮国墓地，尤其是 M27、M26 和 M19 即为例证。只有周人社会中的特权阶层才能获取如此大量的珠子、贝、黄金、铁，以及上品的玉，其中很多是古物。赫尔姆斯认为远方的珍品具有象征意义：“远方攫取是指把工艺品或原生品从社会以外的某地，超越某种程度的地理—空间距离运至本土，跨越文化门槛，从一个多少未知的，或异域的，或神秘的边外地区来到有序的社会核心地区，在那儿，实用性和象征性益加于商品本身。”^[11]我认为，外来物品所具有的象征性尤其受到人们重视。

周人与非周部族不断交流，其中一些非周部族位于周政治势力之内，还有一些则位于黄河盆地中心区以外更为边缘的地带。本文将论证，如果周贵族热衷于采用新材料和新制品，甚至有意识地将其复杂化，他们也会有强烈的愿望创造出同一的使用方式。这种同一，实际上就是中原化，这种做法与《周礼》、《礼记》等著名礼书中的相关记载相呼应^[12]。周人力图通过拥有共同的礼仪系统，以及数字等差居有一席之地的等级制把贵族凝聚起来。此时，这种凝聚显得更为牢固，并成为一种被汉代学者所认同并放大的传统^[13]。

本文先介绍梁带村遗址整体情况，然后阐释礼制改革，它极大地推动了周人在核心区确立礼仪活动的秩序。在观察礼器的新类型时，我将引入套系、组合、成套的概念。礼器不应被单独分析，应视作个人所拥有的一整套物品的组合，其所标示的不应只是新的审美取向，也应包括获取青铜器以及礼仪仪式的新途径。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新的礼仪“套系”的特征。

斯图尔特·皮戈特（Stuart Piggott）在谈到欧亚部分地区引入马车的情况时，对“套系”这一概念所言甚详^[14]。马车不只是一种新型的战争机器，仅获取制成品显然不够，木工是制作和维护马车的基本技术，还需有控制和训练两匹马甚至四匹马的技巧，新的驾驭和战斗技术也需要发展。研究梁带村墓葬中遗留下的其他成组材料，笔者也将采用类似的方法，不是将其当作单件物品，而是将它们当作一整套包括多样化选择、技巧和礼仪习俗在内的成套体系来看待。成组礼器是第一套系，也是本文讨论的核心；第二套系是梁带村所见的棺饰，各种不同材料被整合在一起构成多彩的外观，显示其为葬礼中的一个系列；第三套系是男性和女性的身体装饰，包括男人和女人都佩戴的串饰，男性的金腰带和兵器，以及铜镜、车饰^[15]和盔甲等所有象征男性身份和地位的物品。这些个人饰物和随葬品有多种来源，采用不同的制作工艺，承载不同的社会联系。它们也形成了一个“套系”，创造、体现着所有者的身份。

一 芮国墓地遗址

梁带村墓地是因修公路时发现。2005 和 2006 年发掘了三座主要墓葬，即芮伯墓 M27，芮伯夫人墓 M26、M19（见图二，1、2）。墓中所出众多有铭青铜器记载大子芮伯、芮公，表明他们把自己视为领地上的统治者^[16]。青铜器铭文采用了周人承继自商的文字，这也是芮与周习俗有密切联系的直接证据。确实，芮伯是周王室姬姓家族的一员，他的夫人来自中国东部的姜姓家族。随后，在墓地的进一步发掘中，发现了与本文讨论尤其相关的两座大墓 M28 和 M502。M502 引人注目的是侍者木俑的发现。对于这些木俑，本文不再做更深入的讨论，尽管它们也是非周部族习俗影响下的产物，例如最近发掘的大河口霸国墓地，也发现了髹漆的木俑^[17]。M27 和 M28 均有标志财富和地位的大型车马坑，这是晋国和其他周代贵族都会使用的陪葬方式。

发掘者认为墓地的使用是从北部的 M502 和一个规模略小的中型墓 M586 开始的。接下来的一组是芮伯墓 M27（主墓）及其夫人墓 M26、M19。发掘者认为 M28 要晚于 M27，但墓主也是一代芮伯（见图二，2）。M502 和 M586 属于西周晚期，其他甚至晚于周人在公元前 771 年因失败而东迁，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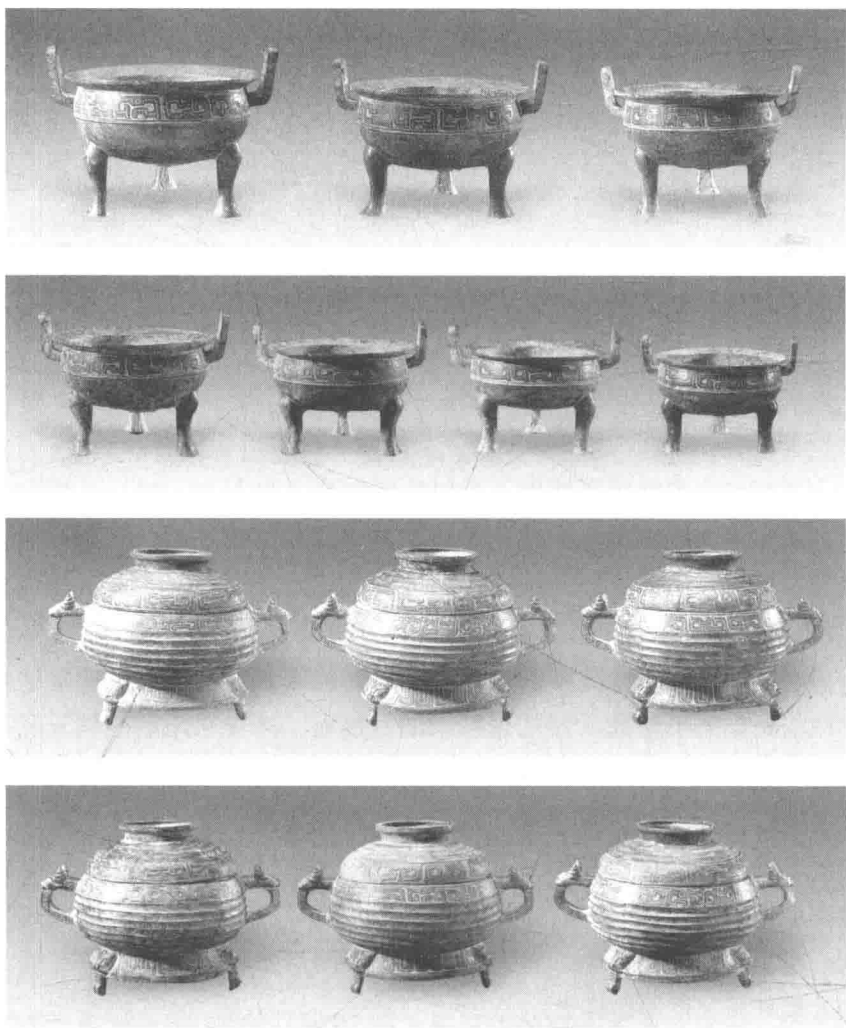
入东周早期。这些主要的墓葬都是土坑竖穴墓，一椁两棺。最大的墓 M502 和 M27 有两个墓道，但是 M28 只有一个。同样地，两个夫人墓 M26 和 M19 也只有一个墓道。如果 M28 确实是芮公墓，作为身份象征的墓道数量，似未一贯沿用。作为本文讨论核心的随葬青铜礼器的数量，甚至棺饰的类型上，M27 和 M28 也不相同，这也将成为我们讨论的一项证据^[18]。

芮国墓地中重要贵族及其夫人墓葬的精细发掘，使我们获得了很多关于易腐材料的详细信息，诸如悬挂的织物、珠子和贝串成的小挂饰等。2012 年 6 月至 8 月，上海博物馆展出了这些棺部装饰的复原场景（见图三）。重要墓葬中的棺饰、敛服和青铜礼器，与著名的诸侯国晋、虢、应、鲁等的墓葬特征相符，表明芮想要或已经完全地融入周人的礼制中。

上述政权中的贵族都使用了相似的竖穴墓（见图二，1），一部分带有墓道。这种丧葬习俗也见于那些统治者是非周族姓的政权，因此，他们可能是有亲缘关系的外族。陕西宝鸡的虢国、山西绛县横水的邰国，都像在大河口的霸国一样，尤其切合本文的讨论。由北赵晋侯墓地以及略早的天马一曲村墓地得知，晋国可能与外族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分散的政权是如何了解周人的礼仪活动的，然而，诸侯必须朝觐周天子。会面时，双方往往有大量的随行人员，这可能是礼仪和丧葬习俗得以传布的途径之一^[19]。此外，正如李峰（Li Feng）所指出的，周王派遣“监”去诸侯国，以确保他们的忠诚^[20]；陈昭容和夏玉婷（Maria Khayutina）也阐述了金文中记载的联姻范围。这些途径把周人治下的不同区域的贵族成员联系到一起。联姻的例子中，周人和非周部族间经常通婚，这也许是周人借鉴和发展外族习俗的途径之一^[21]。

二 礼制改革

芮及其先祖与同时代的周贵族最显著的特征，是随葬大量的成套礼器（图四）。这些礼器放置在精美绝伦的悬饰旁（见图三），单调而乏味，其年代都在大变革——即通常所说的礼仪革命或礼仪改革之后^[22]。同时，早期礼器的仿制品随葬在主礼器组合旁，透露出那些已不再流行的礼仪活动以及先辈的信息。其他的微型青铜器如鼎、带轮的方盒，作为与外部联系的标志，也被埋葬进去，其在礼仪活动中的作用不得而知。



图四 梁带村 M27 列鼎及簋（公元前 8 世纪）

（选自《金玉华年》第 80、81、84、85 页）

礼制改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得到研究者的确认^[23]，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的研究也高度认同这一点^[24]。礼制改革也是三个“套系”中首先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礼制改革在同时代的铜器铭文和传世文献中都没有提及，一些历史学家对其是否存在及其意义表示怀疑^[25]。在公元前 9 世纪这一社会、政治多变时期，周统治的广大区域内，对于标准礼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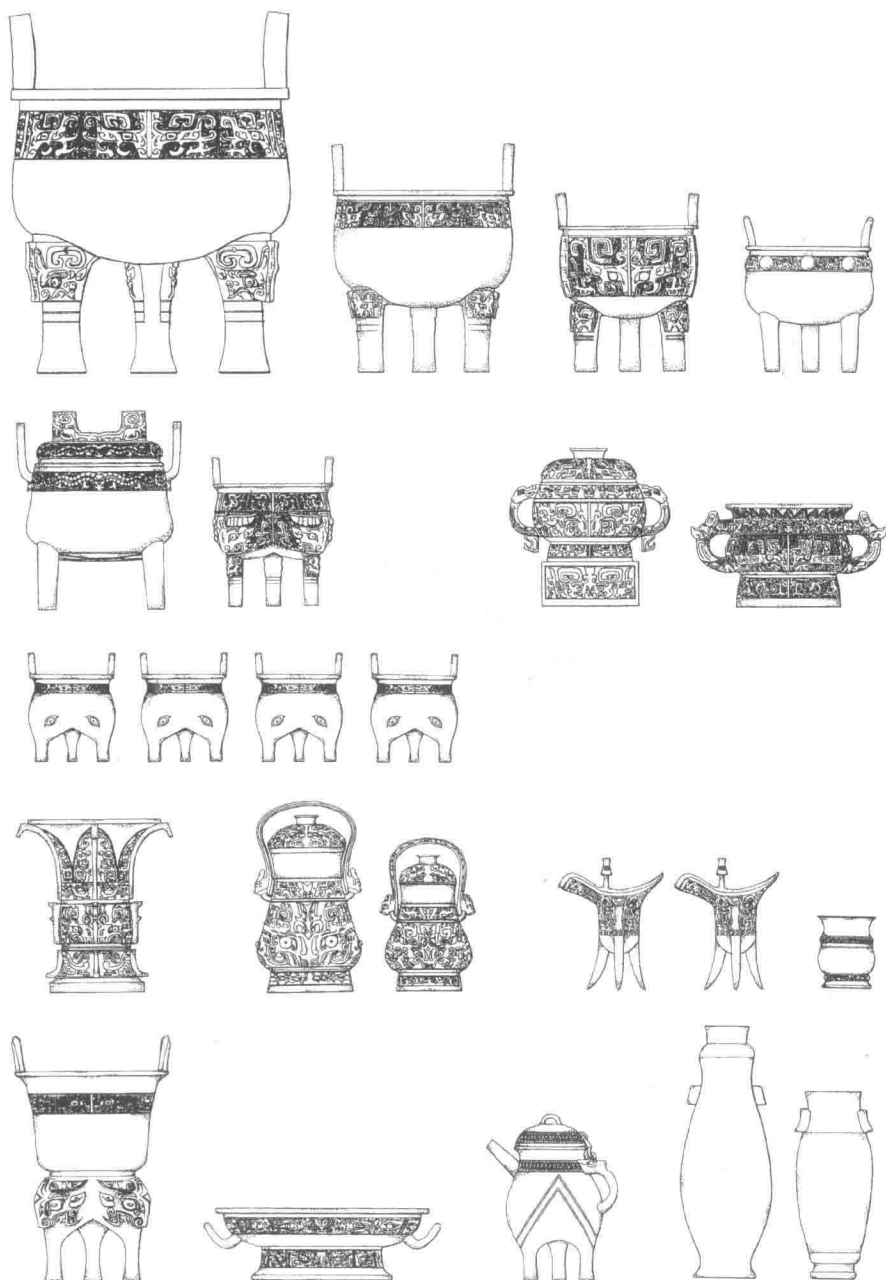
非常相似的组合使用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无疑有助于把周人凝聚成一体。本文将不再审视这一层面，而是集中讨论物质文化上体现出来的周人与外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尤其是在芮国的体现。

礼器组合的变化，以及共出的仿制器和微型器可以反映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礼器组合及仪式存在非常显著的标准化；第二，这种变化中的自主意识通过对古老器形的不断仿制得以体现，仿制器的尺寸通常很小；第三，造成礼器变化和微型器出现的外部原因来自于北方与西北地区。

郭宝钧是 20 世纪较早地认识到礼器器形和纹饰变化的学者之一^[26]。然而，他并没有探究产生这种变化的内涵，也没有指出新的器形意味着器物、仪式、信仰的新“套系”的出现。在青铜器作坊中，铸造全新的礼器组合需要用新的设计体系，并且对于仪式中需要的食物和饮品，也要用新的方式来准备和献祭。

通过比较可以快速确定变化的范围。例如，把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早期墓 M253 所出青铜器（图五），与早于芮国墓地 M27 几十年的属于公元前 8 世纪的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1 所出青铜器（图六）做比较。西周早期的礼器组合中，鼎和簋很突出，尤其是 M203 中所出的一件大鼎（图五，上排左）更为醒目。与之相配的三件酒礼器组合——1 尊、2 卣，有着共同的异常精美的纹饰，另外还包括 4 件鬲。此外，礼器大小、形制、纹饰的不同都表明这些器物可能有不同的来源，是在不同的时间集合在一起的。

三门峡礼器组合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相同的器形和纹饰。琉璃河所出的不太相配的鼎和簋在三门峡被整套的、相配的奇数鼎和偶数簋所取代。鼎大小递减而簋尺寸不变。其他盛装食物的容器如簠、盨已经加入组合。典型器形的重复，以及有限的、简单的纹饰带使铸造更为容易，也使得观察人员能够一瞥之下就了解一个人所拥有的特定器物的数量。三门峡的组合中，所有早期的酒器器形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是一种大型的横截面为方形或长方形的壶，这种壶是由房山琉璃河下腹有弦纹的瘦高壶发展而来的。三门峡 M2001 和芮伯墓地 M27 所出的礼器组合中都包含有编钟，编钟首先发现于属周人势力边缘的宝鸡强国墓地^[27]。事实上，编钟在西周早期便传到强国，可能是由南方沿长江支流传入的。公元前 10 世纪晚期或前 9 世纪早期，编钟成为一种时尚，并且随着礼器的变化而更加常规地使用。由此看来，编钟是中原贵族从周边地区接受青铜器最早的、最突出的例证。



图五 北京房山燕国墓地 M253 青铜礼器组合

[西周早期, 公元前 10 世纪。约翰·罗森 (John Rawson) 绘制]

(参考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第 101~200 页, 文物出版社, 1995 年)